



科场“挟带抄本”

薛 英

明周元晔在《泾林续记》中有一段描述明人考试作弊的手段：

场中传递怀挟，弊端无穷，其术甚巧。隔年募善书者，蝇头细字，写于金箔纸上，每页一篇，工价三分。经书俱千篇厚不盈寸，二三场亦如之。或藏笔管中，或置砚底。更有半空水注，夹底草鞋之类。又用药煮写于青布衣裤上，毫无形迹，将壁泥掺上，旋即拂净，则文字立见。名曰：文场备用。每副价银百两。

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挟带”，另有个流行的名称是“小抄”。这段记述是真实的，不过，这种实物传世却甚少。北京图书馆藏有两件清代这类难得的“抄本”。

第一件是写在十五块黄绢上的一部“类书”。绢幅宽约43厘米，另边长约42厘米，近似正方形。第一块单面抄写全书目录，二至十五块则双面抄写正文。书名就写为《典制》。看目录共抄了天文、时令以至珍宝、庶物等三十三部分。“类书”正是写作诗文不可少的参考工具书。如果说这份“挟带”有什么特点，大约是二个：一是抄的量，约有40万字；一是检索方法较为“先进”。

除第一块抄目录外，其余十四块正反面都均匀地划分为六栏，每栏大致平均抄90行，每面合540行，十四面计7560行，加上目录近8000行，每行约25字，总计约二十万字。再加上另一面则近四十万字了。“每千篇厚不及寸”，这十五张绢叠放在一起也不过半寸，绢与金箔不同，放在笔管内当然不可能，平放在衣服内则不难办。问题是如何去检索，对这一点，抄录者也作了精心的安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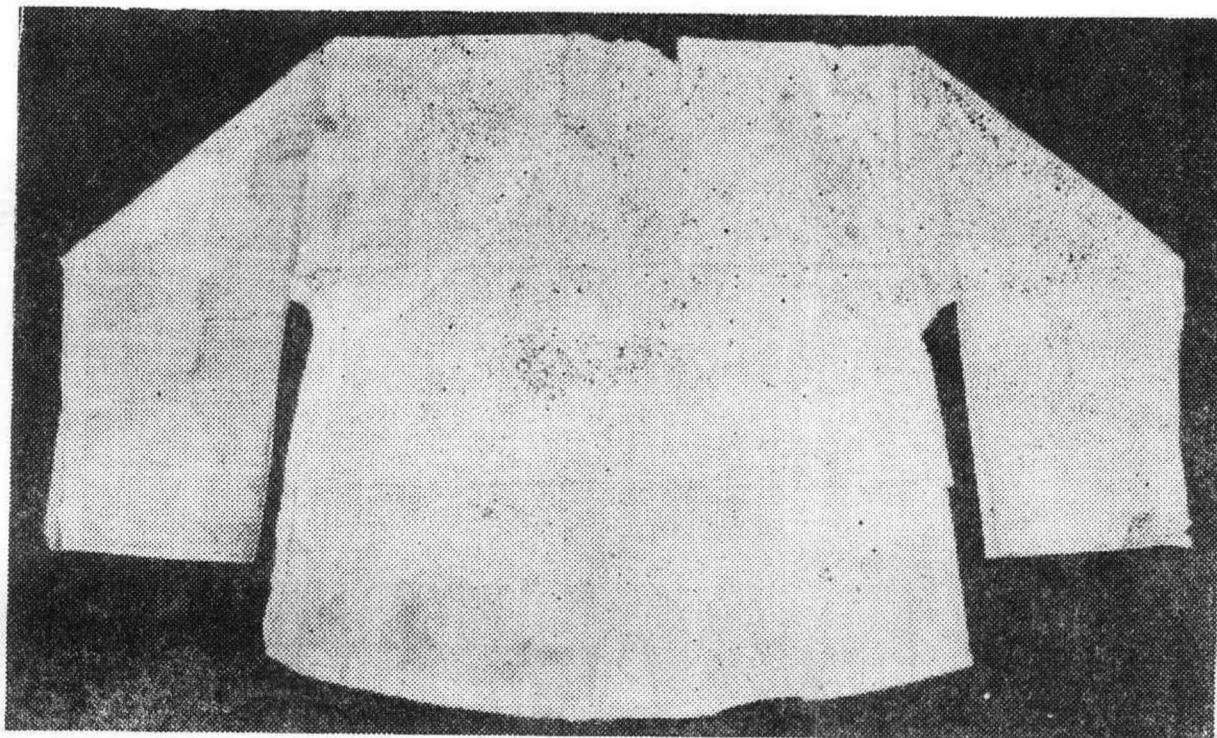
在第一块抄的目录上有朱笔顺序编号，这个顺序号是在抄完全部内容后编定的，是按每张绢的实际起迄编定的。这样，目录上的编号与绢的次序编号完全一致，只要一看目录上的编号就可以知道要找的内容在第几张绢上。一索即得，方便准确。这与我们现在目录下的页码号的作用完全一样。在印刷史上也是少有的资料。这种办法不知什么原因，却没有在板刻古籍上出现。这一点，颇类似于鲁迅先生说的，别人用罗盘去航海，我们却去看风水。要算作板刻研究中一个小小的奇异之处也可以说得过去吧！

“又或用药汁书于青布衣裤”，这种东西未见过，但北图有一件以毛笔写在用绫子作成的衣服上面的“文场备用”。这也是一件少有的实物。（图见封三）

这是一件向右掩襟圆领上衣，长约72厘米，下摆呈弧形，长宽约略相当，袖口宽21厘米，肩至袖口长59厘米，两肩宽65厘米，展平以后，两袖及肩总长近180厘米。可以想见穿衣人之身高。

这件“挟带衣”正反两面抄满了“优秀制艺”，题目均出自《论语》，如“为政以德”（一节）、“文献不足”（二句）等，一共抄了有353篇，估计字数在20万上下，堪称是一部“时文选编”的煌煌巨著了。

我们知道，清初以至中叶，场规之严之具体是少有的。这就是所谓的搜检挟带条例。例如：规定考生衣服的面和里不能缝死，布袜子底要单层，皮袄只能光板，笔杆要挖空，甚至带的饭食象烙饼，馒头都得切开。总之，藏有挟带之处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。进入考场则全面搜检，贴身内裤亦不能免。所以有人写诗说“襟解怀开遍体搜”，全是真实写照。据记载，清乾隆九年顺天府乡试，一次就搜出四十余人，立即枷示。当场人心为之震慑，立时散去者二千余人。当然，到清后期这种搜检也就变成了例行公事。然而，也不知如何地机缘凑巧，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件上衣。真算得上是“吉光片羽”，从这两件特殊的“抄本”中，也似乎能使我们想象到那时考试制度弊端之深且重的吧！



北京图书馆藏夹带衣正面



夹带衣局部